

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 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以慈溪“家庭作坊”为例

JIQUN SHENGJI BEIJING XIA DE FEIZHENGGUI
JIUYE YANJIN JILI YANJIU

曲亮 陈敏 姜晓慧 等著

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 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以慈溪“家庭作坊”为例

曲亮 陈敏 姜晓慧
蔺力 李海秋 著

F279.245

Q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以慈溪“家庭作坊”为例 / 曲亮，陈敏，姜晓慧等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81140-443-2

I. ①集… II. ①曲… ②陈… ③姜… III. ①家族—
私营企业—经济发展—研究—浙江省 IV. ①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1669 号

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以慈溪“家庭作坊”为例

曲 亮 陈 敏 姜晓慧 等著

责任编辑 郑 晶

封面设计 陈思思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

藏书印记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1011199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34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443-2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T1011199

总序

企业和家庭是构建这个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性组织,前者创造的是社会财富,后者则是人口的摇篮。围绕这两个特殊的组织,不同的人文和社科领域都派生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努力为解释客观现实以及有效地预测未来服务,管理学也正是其中之一。

作为经历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历史变革特殊时期的管理学研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始终与变换的环境紧密联系。回顾过去 30 多年的历程,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为基本表现形式的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对于社会组织而言,这无疑是本质性的制度变革,从经济社会主体的构成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国际环境也经历了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到金融危机的大起大落,从各国政府、区域联盟到国际企业都处于巨大的压力和变革之中,这无疑给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也为管理学研究平添了许多压力。从某种意义而言,“管理是由这个社会 20% 的人员所从事,但是却肩负着其余 80% 人员的福祉”。

作为承载管理学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高校,如何在变革的时代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价值,以知识和人才为途径传递学者对时代呼唤的响应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论题。这个论题有三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谁? 我们关注他们什么? 我们如何关注?

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很广泛,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现实全景,由于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更多地从属于工商管理专业,因此企业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基于企业,我们确实可以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以往的主流研究强调企业的股东属性,因此立足企业的所有者。我们分析和探讨了价值链各个环节以及不同时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丰硕的研究

成果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企业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必须从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去审视管理学本身,这个问题在公司治理研究中尤为明显。公司治理是管理学的经典研究领域之一,也是指导现实企业发展的有力工具。公司治理文献长期关注的是经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基于代理成本问题的分析,Jensen 和 Meckling(1976)的开创性工作引发了对公司治理中管理层激励的规范性思考,而 Townsend(1979)则第一次尝试以最优契约的方式解决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对于古典企业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代企业基于企业规模和风险规避的需要将股权进行分散和交叉,股东由个体转变为一个群体,经典管理研究的诸多成果遭到质疑。

按照 Shleifer 和 Vishny(1997)、Pagano 和 Roell(1998)等的研究结果发现控制性投资者(例如股份公司的大股东等)凭借其实际控制权,以合法或者法庭很难证实其非法的方式,谋取私人利益,使分散投资者(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以至在这些公司中,基本的代理问题不是在经理人与投资者之间,而是在控制性投资者与其他分散投资者之间。Johnson、LaPort 等(2000)甚至把大股东利用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把低层企业的资金转移到高层企业,从而使小股东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称为隧道行为(tunneling)。这些成果已经证实,尽管都是企业的所有者,但是不同股东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协调关系,股东利益群体产生了分化。

与此同时,对于企业就是股东所有的争论也不断升级,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理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微观机理,就成了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尽管以布莱尔(Blair, 1995, 1996)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分析主体,认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注入了一定专用性投资后,他们或许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所以应该分享公司的控制权。但是在一般经营情况下,企业的外部非决策类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和债权人、消费者等是不需要参与企业经营的,一种“隐形”的委托—代理关系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授权给内部的股东和经理层。但是当企业处于特殊状态时,如创业期或濒临破产时,债权人或政府就要参与治理。在此基础上,在利益相关者思想的影响下,企业现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表现为货币资本、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环境所有者在内的要

素所有权,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利益主体在微观层面博弈的平台,因此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不可避免地步入我们研究的视野,而管理学对于这些主体的共性归纳就是——组织,也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主体。

将组织再次作为我们关注的核心主体,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菲佛和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教授所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一书中指出,“组织是充满巨大的力量和能量的社会工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场所或框架,组织行为参与者用自身的诱使因素与组织的贡献相互交换的场所”,为了实现这个意义,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为了获取资源,组织就必须与控制管理的组织相互交往,在这一意义上,组织就会依赖它们的环境。由于组织对它需要的资源没有控制力,资源需求就会成为问题并具有不确定性。组织为了获取资源而与其他组织进行交易,资源控制权使得其他组织具有对组织的控制权,组织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对环境偶然性进行管理的能力。因此大多数组织活动的焦点在于通过交换协商来确保所需资源的供给。”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生存是组织存在的唯一目标,而战略就成为实现该目标的有效途径。因此,战略就成为我们关注组织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企业都力求通过制订和执行有效的战略决策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因此对于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战略管理分析强调企业与环境的互动,对于环境的普遍认识是将其划分为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经典战略管理理论更侧重于行业环境分析指导下的企业定位研究和企业内部环境分析指导下的企业能力研究,相对弱化宏观环境对于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事实上,新时期的企业战略决策研究必须强调特殊历史环境下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应该将宏观环境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分体现中国转型经济发展特色的情境因素和适应全球化新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进而对企业战略分析提出全新的视角解析。

组织在变、环境在变、管理实践在变,管理学研究也同样需要变,这种变就是创新。创新不仅仅是一种内容的体现,更是我们的一种态度。管

理学发展的方向就是利用创新的手段将管理理论与组织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就是利用创新的态度将管理学不断推向前沿的过程。

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学研究基地是浙江省政府设立的首批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理念下,基地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专业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秉承“学科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科学研究为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服务”的发展目标,以企业管理领域现实问题和前沿问题为研究中心,完善组织架构,推出科研精品,凝聚学科特色,提升发展水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良性的发展态势,逐步形成了四个具有特色的研方向: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营销与创新管理。基地科研人员众多科研项目都是围绕企业管理学科以及组织、战略和创新研究方向展开的。“组织·战略·创新”学术文集第二辑收集了近期基地青年博士的研究成果,普遍为省部级以上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云宏

2011年12月

前　　言

《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是将非正规就业理论的前沿成果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相结合的产物。自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界定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 IFS)和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 IEM)概念以来,IEM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的中心之一。ILO为许多经济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制订了全国性或地区性就业发展计划,使IEM理论逐步演变为一种指导这些国家就业决策的规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经济体系遭受重创,在消费信心严重不足的同时,还带来了沉重的失业灾难。ILO在2010年1月27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份关于2009年全球就业形势的报告。该报告中称,2009年全球失业率达6.6%,失业人数为2700万人。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全球经济震荡期里,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始终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非正规就业重新纳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失业的沉重压力羁绊着经济的回暖,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各国都在寻求解决之道,而IEM所代表的灵活就业成为多数国家的首选。ILO和WTO共同进行的研究课题结论表明,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已高达80%。

转型期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就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模式被打破,IEM得到迅速发展。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城镇IEM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可能达到50%。由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主体回归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释放出大量冗员,使潜伏已久的隐形失业显形化;加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总量相对于自

然资源和资本的过剩以及被称为“创造性摧毁”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得我国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以正规化就业为主的单一就业模式日益被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的二元化就业模式所取代,IEM 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失业问题的一项战略选择。本书中所指的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而言的,不同于正规的全日制工作、与用人单位建立有稳定的劳动法律关系、获有稳定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就业形式,而是指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IEM 是结构变动,包括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 IEM 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非正规就业大军迅速壮大,其原因何在,有什么内在机理?特别是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内的特殊 IEM 现象研究不仅补充了一般非正规就业现象、机理的研究内容,而且对浙江省这种特殊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作为卫星式产业集群,其特征是中小企业居多且基于低廉的劳动成本。此外,浙江省特有的“一镇一品”现象,也只有从 IEM 的视角,才能更好更全面地解释其形成的机理。因此无论是立足非正规就业理论的发展态势,还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情境研究,该问题都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

本书上篇试图对我国 IEM 形成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它以中国转轨时期大背景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变动为主线,并结合经济增长、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等影响因素,从 IEM 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借鉴国外的 IEM 形成理论,分析我国 IEM 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环境,论证 IEM 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产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 IEM 形成的机理。其中,适应 IEM 的劳动者供需状况和制度环境是核心要素。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内外关于 IEM 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已有很多论述,对此本书不作重点研究,只在综述中对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概述。另外,低端 IEM 和高端 IEM 的性质有很多差异,其形成和影响因素也不同。当前我国的 IEM 主体还是低端 IEM,并且在我国 IEM 形成过程中也以此为特色,因而本书主要研究低端 IEM 的形成,高端 IEM 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在本书中偶有涉及。

至于本书下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浙江产业集群内的农民工和家庭作坊两类非正规就业群体。鉴于集群内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农民工存在较大的区别,有必要将集群内农民工的特征和行为模式做单独的探讨。其中,家庭作坊指的是家和工厂连成一体的生产单位,雇佣工人人数在5人以下。此外,对于创业者、个体工商户等非正规就业者,下篇不进行详细的论述,只在必要时充当比较对象。另外,转型升级作为本书的研究背景,其有关内容主要在文献综述中进行叙述,具体的升级路径在正文中为已知量,即在正文中不对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进行分析对比。

本书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指出 IEM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IEM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因而,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我国 IEM 问题的研究,为国家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理论界对 IEC 和 IEM 的研究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同时,由于 IEC 和 IEM 的特殊性质,难以对现实经济中的 IEM 实际规模进行科学统计,而国际上的统计口径也很不一致。因此,研究 IEC 和 IEM 问题将有助于达成共识,使政府部门更加重视 IEC 和 IEM 问题。

当前理论界大都看到了中短期 IEM 在缓解就业压力、安置弱势群体就业、应对多变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劳动成本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不稳定的就业方式究竟是否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是否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究竟只是失业和就业两种形态之间的跳板还是预示着未来就业模式的发展趋势?本书立足中国转型的视角给出了研究的基本结论,为非正规就业理论的演进态势做出了判断,非正规就业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广泛存在,但是他存在自身升级的路径。

作为另一个理论贡献,本书对家庭作坊类 IEM 的分析,完善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特征描述。在国内现有对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研究中,其主要对象为农民工这类非正规就业人员,对家庭作坊、小企业这两类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研究较缺乏,而家庭作坊和小企业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表现行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另外,家庭作坊极有可能转变为小企业,因此本书重点分析的家庭作坊类 IEM 的特征性质,一方面是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特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对非正规就业之间转变路径的一

种探索。

特别是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构建的浙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分析能力,对于解读非正规就业的中国情境提供了新的思路。浙江产业集群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产物有其特殊性,国外的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浙江的产业集群现象。通过建立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的框架,从劳动者的角度探讨集群的发展之路,能更好地解释浙江集群的竞争力和集群内企业的行为模式,也就能更好地描绘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之路。不仅如此,通过此视角还能有效地解释集群的路径依赖和集群“低效锁定”现象。此外,对我国集群内非正规就业规模进行分类和测算,通过细化测算的方法来提高测算准确度。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测算和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测算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一大难点,本书将采用区域聚焦方式,以集群为载体,通过测算某一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人数,来预测全国相似集群此类人群规模。将非正规就业群体划分测算,以此来弥补整体数据的不足和低准确性,从而提高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测算准确度。

就现实而言,全球化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给转型国家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挑战。科学技术、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生产要素,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幅调整,为发展中国家推行 IEM 提供了新机遇。但由于经济、技术进步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应积极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运行规律,改善我国 IEM 领域中大部分属于低技术要求、低效率产出的现状。本研究为集群转型成功与否提供另一种参考指标。产业集群的类型不同,其竞争力的体现也有所不同,作为卫星式产业集群的浙江产业集群,其转型成功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产能和大型企业的数量上,还要体现在原有灵活性和高市场敏感度上,而家庭作坊体现的活力正是产业集群灵活性的保证。因此,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转型的成功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成功。

此外,本书还为政府部门出台转型政策提供参考。集群的转型涉及多方面问题,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政府提出的政策不但要促进集群的转型升级,还要尽可能地保障各方的利益,特别是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各项保障措施。本书的研究立足非正规就业视角,为政府出台如何指导非正规就业者的转型政策提供了参考。

本书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集群升级背景下的‘家庭作坊’演进机理研究——基于非正规就业的视角”(编号:10YJC630197)核心成果

浙江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学)重点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项目重要成果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编号:09CGYD027YBQ)重要成果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浙江省制造企业逆向迁移、知识网络重构与内部能力跃迁机理实证研究”(编号:11JCGL022)阶段性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001
第二节	研究内容、结构与方法 / 006
第三节	主要观点、难点和创新点 / 010
第二章	非正规就业(IEM)及集群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 / 012
第一节	非正规就业(IEM)理论的国外研究历史及进展 / 012
第二节	国内学者对 IEM 概念的植入及其理论、实践发展 / 031
第三节	IEM 社会效应的争论 / 034
第四节	产业集群升级路径研究回溯 / 037
第五节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论 / 040
第三章	IEC 和 IEM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 043
第一节	IEC 和 IEM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 043
第二节	我国 IEM 的总体规模和特征 / 045
第四章	我国 IEM 的因素分析和形成机理 / 055
第一节	解释 IEM 的理论基础 / 055
第二节	转型期中国 IEM 的成因分析 / 058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 IEM 的形成发展机理 / 078
第五章	转型期中国 IEM 的模式分析 / 082
第一节	IEM 和“上海模式” / 082
第二节	IEM 和“浙江模式” / 092
第三节	沿海城市的“加工车间”与非正规工人 / 094
第四节	IEM 与高校毕业生择业 / 103

第六章	产业集群内非正规就业形成因素分析 / 110
第一节	产业集群内输入型 IEM 的形成因素分析 / 110
第二节	产业集群内自发型 IEM 的形成因素分析 / 129
第七章	集群升级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分析 / 138
第一节	产业集群内 IEM 影响因素的演变分析 / 138
第二节	产业集群内 IEM 演进路径分析 / 147
第八章	产业集群升级下非正规就业演进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慈溪为例 / 170	
第一节	产业集群案例的选择 / 170
第二节	慈溪市家电产业集群中 IEM 的特征分析 / 179
第三节	慈溪市非正规就业的统计分析 / 187
第四节	慈溪家电产业集群升级下 IEM 的演进分析 / 196
第九章	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和 IEM 演变的政策建议 / 199
第一节	IEM 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 199
第二节	产业集群升级要兼顾非正规就业 / 203
第三节	推进 IEM 发展的政策建议 / 206
第四节	促进 IEM 发展演变的政策建议 / 210
附录 / 215	
主要参考文献 / 221	
后记 / 230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界定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 IFS)^①和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 IEM)概念以来,IEM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的中心之一。ILO为许多经济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制订了全国性或地区性就业发展计划,使IEM理论逐步演变为一种指导这些国家就业决策的规范。

荷兰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注重发展非正规就业,丹麦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家政服务计划,意大利政府推出了“荣誉贷款”计划,德国政府设立“搭桥津贴”计划,美国、日本、波兰也采取了具体措施以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4—1995)数据表明:全世界IFS产出在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35%。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就业现象尤为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85年这一比例占到城市总劳动力的60%,亚洲各国80年代这一比例为40%~66%。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经济体系遭受重创,消费信心

^①为了行文简洁,文中采取了若干英文字母缩写形式,主要有: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简称IFS)、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简称IEM)、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简称IEC)、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Informal Employment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EMLO)、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LO)。

严重不足的同时还带来了沉重的失业灾难。ILO 在 2010 年 1 月 27 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份关于 2009 年全球就业形势的报告。报告里称,2009 年全球失业率达 6.6%,失业人数为 2700 万人。在这一份多达 82 页的报告中还指出,2010 年的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预计发达国家还将有 300 万人失业或找不到工作。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青年失业数增加了 1000 万人,这是该机构自 2001 年全球统计以来青年失业数最高的数据。另外,美国劳工部在华盛顿发布的数字显示,2010 年 7 月 17 日当周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 3.7 万,达到 46.4 万,超过彭博新闻社调查经济学家的最高预期。

失业的沉重压力羁绊着经济的回暖,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各国都在寻求着解决之道。2009 年 9 月,G20 峰会上达成了全球结业协定,并声称“在构建未来的经济增长时要以就业为导向,经济重振的核心是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而 IEM 所代表的灵活就业,成为多数国家的首选。ILO 和 WTO 共同进行的研究课题结论表明,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已高达 80%。

转型期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模式被打破,IEM 得到迅速发展。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城镇 IEM 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可能达到 50%。由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主体回归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释放出大量冗员,使潜伏已久的隐形失业显形化;加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总量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的过剩以及被称为“创造性摧毁”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得我国失业问题进一步凸现。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以正规化就业为主的单一就业模式日益被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的二元化就业模式所取代。IEM 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失业问题的一项战略选择。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IEM 是结构变动,包括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 IEM 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非正规就业大军迅速壮大,其原因何在,有什么内在机理?这些构成了本书上篇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外,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本就存在较大差距,随着改革

开放的推进,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愈加突出。东部地区的浙江省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 3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崛起,不仅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前列,更是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进入该地区,形成了庞大的 IEM 群体。据《宁波市统计年鉴(2009)》相关数据显示,余姚、慈溪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口已超过了本地人口。更重要的是,浙江省内存在大量的自发型非正规就业,这些就业者不为别人工作,而是采用家庭作坊形式制造产品。这种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的家庭作坊模式,这种“富裕”的 IEM 所显现的特殊性,不仅是研究 IEM 存在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绝佳素材,更是窥探产业集群内在动力的偏锋视角。据统计,浙江省共有 1300 万非农从业人员,个体从业人员约有 280 万人,占非农从业人员总量的 21.5%,加上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兼职就业、城镇自由职业者、正规单位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等,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估计会超过非农从业人员的一半。^①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内的特殊 IEM 现象研究不仅补充了一般非正规就业现象、机理的研究内容,更是对浙江省这种特殊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作为卫星式产业集群,其特征是中小企业居多且基于低廉的劳动成本,此外,浙江省特有的“一镇一品”现象,也只有从 IEM 的视角,才能更好更全面地解释其形成的机理。

因此,基于浙江省 IEM 的特殊性,本书下篇将注重分析这类特殊 IEM 的形成因素,剖析其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因素的变动,探讨其今后的发展演变路径。

二、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第一,IEM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IEM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因而,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我

^① 《非正规就业人员养老问题研究》,<http://www.tzls.gov.cn/info704—1.htm>。